



高教动态

2020年第3期（总第3期）

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20年12月01日

目 录

行动指南

中共教育部党组部署教育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1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工作的通知》 .. 2

改革视点

评价教师不唯学历和职称，评价科研不唯论文和奖项，评价论文不“以刊评文”
—— 破“五唯”，第五轮学科评估的突破口 4

高教研究

大学战略规划中需要处理的若干关系 11

“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与关键 20

省内速递

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2020年会暨陕西高等教育论坛成功举办 35

陕西省召开学科建设工作会议 36

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 37

【行动指南】

中共教育部党组部署 教育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教育改革发展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日前，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通知，部署教育系统切实做好全会精神的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准确把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的深刻含义，准确把握中央对“十四五”时期形势的重大判断，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到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准确把握全会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部署，全面系统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的传达学习工作，加大对全会精神的研究阐释力度，创新形式载体加强宣传引导，迅速掀起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热潮。

《通知》强调，“十四五”时期，要把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升教育服务贡献能力，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通知》对科学编制好教育“十四五”规划作出了部署，要求各地各高校把科学编制好教育“十四五”规划作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要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好“十三五”规划总结评估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切实把全会精神落实到“十四五”教育发展全过程、各环节，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开好局、起好步。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0年11月18日）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

做好“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工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和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进一步推动各地教育部门抓思政课建设主体责任落细落实，持续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键课程的作用，2020年11月5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工作的通知》。通知全文摘录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全面提高高校思政课质量和水平，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工作目标

充分发挥各地的区位优势 and 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省级层面打造一批品牌工作项目，总结凝练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进而形成比学赶帮超的工作机制，持续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

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把高校思政课办得越来越好。

三、工作要求

1. “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自2020年起每三年为一个周期。各地教育部门要强化项目化、制度化精细化管理，每年进行常态化推进，原则上一个周期内不再进行项目工作内容调整，确保持续发力、做实做深、落地见效。

2. 教育部将根据各地实施情况对各地“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每年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各地教育部门和项目牵头单位可给予配套经费支持，并制定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各牵头单位统筹专项经费的具体使用，确保专款专用，符合有关规定。

3. 各地教育部门要每年定期进行工作成效评估，总结经验成果，完善工作路径，进一步做好动态指导和深化。教育部将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对各地工作成效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拨付专项经费。

4. 各地教育部门要注重总结提升，加大工作宣传力度，将有效的工作举措、宝贵的工作经验转化为典型案例、制度机制，相关好经验好做法在本地推广，并形成总结材料报教育部（社科司）。

附：

“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任务清单

（2020—2022年陕西省任务清单）

地区	项目名称	牵头学校
陕西省	学校思政课教师“大练兵”创优行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

注：其它各省略。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0年11月5日）

【改革视点】

评价教师不唯学历和职称，评价科研不唯论文和奖项，评价论文不“以刊评文”

—— 破“五唯”，第五轮学科评估的突破口

与评估有关的事，总会触动高校的神经，学科评估更是如此。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看来，“学科评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其评价体系往往呈动态演化特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龚旗煌则直言，“教育评价事关教育的发展方向。”

3日，备受关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来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印发《关于公布〈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宣布拟启动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

在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当下，此轮学科评估有哪些新特点、新要求？在破“五唯”方面又将有哪些具体举措？

一、形成相对成熟的学科评价体系

● 推动学科建设整体水平提升

什么是学科评估？

“我国实施的学科评估制度，是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的整体水平评估。”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葛道凯如此解释。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阎光才介绍，自2002年首次开展学科评估工作以来，评估方案几经修改与完善，不断继承创新，一方面表明了学科评估所始终坚持的问题导向与对社会各界不同声音的开放包容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评估过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经过近20年的探索实践，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学科评价体系。学科评估遵循教育规律，依托广大高校、专家学者、专业组织共同研究制定指标体系，凝聚最大共识，以评促建、以评促升，推动我国学科建设整体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学科评估为政府、高校、社会提供了高等教育信息，为政府的教育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也促进了全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学科评估对高校学科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指挥棒’作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指出，学科评估是对高校学科建设行之有效的周期性检验，高校通过评估查找短板与不足，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学科建设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优化学科资源配置，深化内涵建设，促进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本轮评估的亮点是什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透露，第五轮学科评估按照“改革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要求，将在以下十个方面改革完善：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破除“五唯”顽瘴痼疾；进一步强化师德与师能相统一；进一步突出质量、贡献和特色；进一步强化分类评价；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进一步提升评估信息可靠性；进一步提高专家评议质量和评价科学性；进一步完善结果发布方式；进一步强化评估诊断功能。

二、学科评估，难在哪儿

●热衷追逐“学术GDP”

为什么说学科评估是世界级难题？杨卫从历史的角度解释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科评价多采取基于专家评议的主观评价体系，但随后出现了学派之争，导致了少量压抑后进、有失公允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伊始，南京大学率先推进基于客观引用数据的评价体系，在当时推动了评价的客观化、量化。但随后学术界乃至行政部门为其客观性和操作简便性所倾倒，把客观评价体系推向极致，而同行评议的分量逐渐削弱。日积月累，对以定量指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怨声渐起，引发了我国从客观至上的评价体系向主客观结合的评价体系的转变。学科评估也历经了上述介于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的博弈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周光礼直言，长久以来，中国大学始终被缺乏合理、准确、系统的评价标准所困扰，各种国内外的商业机构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以文献计量方法建构各种“洋标准”“洋指标”“洋名次”，给中国大学乃至全球大学产生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其中，基于科学主义评价范式的大学排名，将

中国大学导向浮躁与功利，最近公布的有些世界学科排名将科学主义评价范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实际上，能够被量化的东西可能并无价值，而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不能量化。在破“五唯”的背景下，有必要全面反思世界大学排名的弊端。

“重科研，轻育人。”在周光礼看来，在这些世界大学排名的导向下，国内大学热衷追逐“学术GDP”，也是“五唯”兴起的重要原因。现有的世界大学和学科排名基本上是以科研为导向，有些排名将科研成果的指标极端片面化，权重急剧扩大化。比如ESI只是一个学术发表指标；从评价体系可以看到，主要国际排名的科研权重占比超过60%。这是因为科研成果较人才培养更为显性，科研成果的数据较易获取且易处理，而人才培养指标缺乏国际通用的衡量单位。

这的确是待破解的难题之一。杨卫以人们经常引用的ESI数据为例——

在数学领域，我国大学按照十年累计学术影响力排序为：山东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按照十年累计学术产出的排序为：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

“任何一位对我国数学领域的学术地貌图有研究的专家都会认为第二份单子（按学术产出排序）要比第一份单子准确。但大多数排名机构却往往以第一份单子，甚至将第一份单子中的学术影响力除以第二份单子中的学术产出（即单位学术产出的学术影响力）来作为其排名指标。于是就产生了US News的最新排名中将曲阜师范大学评为第一，北京大学评为第二的结果。”杨卫说，与大多数的学科以学术影响力论英雄不同，数学工作越为深奥，能从学术上看懂甚至听懂的人就越少。数学名校常以纯数学见长，但其引用次数往往远小于应用数学的工作；另外，还有冷门与热门的不同，数学中与“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或“动力系统”有关的论文的引用往往比对“数论”“拓扑”这些分领域要大得多，因此一些理工科大学、师范大学的数学论文的引用也不见得比数学强校低。有鉴于此，ESI引用数不能作为评价所有学科的唯一标准。

三、学科评估的新突破：破“五唯”

●不将SCI、ESI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

破“五唯”，也是第五轮学科评估的突破口。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评价科研水平不唯论文和奖项，将设置“代表性学术著作”“专利转化”“新药研发”等指标，进行多维度科研成效评价。评价学术论文聚焦标志性学术成果，将采用“计量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中国期刊与国外期刊相结合”的“代表作评价”方法，不“以刊评文”，淡化论文收录数和引用率，不将SCI、ESI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突出标志性学术成果的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着力扭转“SCI至上”局面。坚持代表性成果专家评价与高水平成果定量评价相结合，将充分运用基于定量数据和证据的“融合评价”方法。

周光礼认为，第五轮学科评估注重多元评价，采用多维方法。评价教师不唯学历和职称，不设置人才“帽子”指标，避免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片面做法；评价科研水平不唯论文和奖项；评价学术论文聚焦标志性学术成果，不将SCI、ESI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规定代表作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等，“这充分体现了多维评价的原则。”

杨卫将此次学科评估归纳了五项创新：一是在客观数据展示上采取结构性证据链，充分运用“融合评价”，建立专家“元评价”制度；如在教育与育人方面，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位，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培养过程质量”“在校生质量”“毕业生质量”四维评价体系。

二是在学术贡献划分上提出归属度原则；既避免“一稿多投”，又避免“学科壁垒”；鼓励学科交叉融合和学科生态优化，确保跨学科成果合理使用；教师成果按署名单位认定、不随人走，抑制人才无序流动。

三是在指标权重上遵循重质量的原则，评价科研水平不唯论文和奖项，评价学术论文聚焦标志性学术成果，采用“计量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中国期刊与国外期刊相结合”的“代表作评价”方法，避免在收录论文方面数豆子，按照不同学科领域的习惯来衡量学术成果的影响力。

四是在评估结果呈现上采取多元化优化分档，多元呈现评估结果，分类发布总体结果与提供单项评估结果相结合；设置“代表性学术著作”“专利转化”等指标，对科研成效进行多维度评价。

五是注意到不同学科的体容量特征，考虑门槛高度与临界质量的辩证关系，探讨如何在高门槛学科（如核能、航宇、天文）避免由于学科点数量太少而造成的高端零和博弈陷阱，以及如何避免在连片学科中由于区别度较弱而产生的选择性堆积行为。

四、学科评估的新取向：推动定量与定性评价的有机结合

● 浓缩粗放的数量 摒弃简单数帽子

新方案针对简单量化取向而带来的种种流弊，提出淡化简单计数方法，实行定量与定性、数量与质量、计量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的原则。阎光才分析指出，“淡化量化评价并非完全弃用数据，而是重视有品质的量。如在科研评价上，仅对国家级奖励等高水平科研奖励纳入定量统计范围，把过去粗放的数量浓缩为代表性的论文、著作与专利成果，重点考察成果的理论原创性、前沿突破性与实际贡献。与此同时，把典型案例与凸显自身特色的开放性‘留白’作为定性评价的素材，两者可以相互补充或验证。”

“此外，对师资队伍建设的评价，摒弃了简单数帽子的做法，注重师德师风和教书育人的表现，且把队伍的结构优化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成长作为重要的观测点。新方案强调质与量、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它体现了学科建设过程中个性特色与表现形态的多样性、整体与局部不可剥离的统一。”阎光才说。

学科评估的新取向，摒弃了简单数“帽子”的做法，也可抑制人才无序流动的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教师成果严格按产权单位认定、不随人走，对于引进人才在原单位取得的成果，不在新单位统计使用。同时，强化教师以教书育人为首要职责的评价导向，将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和指导研究生情况作为重要观测点，引导教师潜心教学、全心育人，避免产生通过大规模聘用“专职科研人员”专攻科研指标、忽视人才培养的不良倾向。

这种有机结合的评价方式，也得到了林忠钦的认可。“立德树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师德师风建设机制、解决卡脖子技术的社会贡

献、标志性学术成果等指标，或者是软性指标，或者是代表性案例，或者是难以量化评价的指标，采用基于客观数据和证据的定性评价是更加科学的评价方法。这些定性评价的指标导向更加鲜明，更加关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对国家、区域所创造的价值和实际贡献。通过定性评价，深挖了质量内涵，扩展了评价维度，丰富了评价时空。第五轮学科评估既对学科的底蕴有评价，更是学科建设现状的反映，还有对未来发展的思量。”

五、学科评估的新方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

● “三报一刊”文章作为重要研究成果

“现有的世界大学排名几乎都是偏向自然科学的，尤其是医学和生命科学。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塑造下，中国学界流传‘没有医学院的大学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神话，重点大学纷纷合并医科大学。在这种错误导向下，中国乃至全球大学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忧思的现象，即大学开始裁撤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因为人文社科专业对大学的世界排名贡献不大。”周光礼直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萎缩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一个是大学的道德领导能力大大弱化，大学已经很难站在道德高度引领社会、批判社会。另一个是大学立德树人能力大大弱化，诸多大学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德育普遍边缘化。大学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评价体系均不支撑大学德育。

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要加快构建科学权威、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本轮评估改革更加强调政治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把住学术评价中的政治关。同时，更加彰显中国特色。重点考察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在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等方面的特色和贡献，凸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如将‘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杂志，编者注）文章作为重要研究成果，规定代表性论文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强调课程、教材评价更加突出思想性、时代性，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体现中国实际。”

“此外，更加体现学科特点。淡化实验室、基地等条件资源类指

标，强化对学术著作、艺术实践成果等进行‘代表作评价’，适度降低学术论文等指标权重，不设置专利转化等指标。对于人文学科，强调其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等方面贡献；对于社会科学，鼓励其在中国实践中形成中国方案，研究解决中国重大问题；对于艺术学科，突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特点，更注重考察其实践性，强调科学研究与艺术实践并重。更加突出服务社会。充分认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在政策咨询、智库建设、公共服务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贡献。”这位负责人说道。

“任何评估都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不妨说根本就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方案。有问题就改弦易辙和推倒重来，相对于这种问题取向的探索性改进所带来的风险更大。故而，新一轮学科评估既具有制度演进的稳定性特征，其探索性创新成效也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阎光才最后强调。

（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4日 作者：晋浩天）

【高教研究】

大学战略规划中需要处理的若干关系

刘献君

“十三五”即将结束，“十四五”即将开始。回顾和总结大学战略规划的发展过程，为使大学战略规划更加科学和有效，应处理好三个关系，做到三个结合，即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战略重点和一般相结合，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

一、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

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客观事物是作为过程存在的。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完整的过程，而过程又是由一个一个阶段组成的。事物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学校的发展亦如此。因此，在战略规划的制定中要将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

1. 连续性和阶段性结合，审视我国大学战略规划的发展历程

1956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开始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道路，这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正是在这一年，高校开始制定战略规划，如我见到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五年综合规划。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校战略规划中断。1980年起，随着国家发展规划的制定，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一些高校开始制定“六五”、“七五”发展规划。21世纪初，因为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要求，各高校都开始制定发展规划，即“十五”、“十一五”规划等，规划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取得一定成效。

由于战略规划制定是由上而下展开的，加之过程又非常复杂和艰难，在开始时规划的作用多停留在“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实际并未产生多大效用。因此，学术界、高校开展了对战略规划的持续探索。例如，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在西安举办了“大学校长与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众多校长、学者参加。首先，这次会议提出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要站在战略管理的高度将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有机结合。其次，提出学校领导

要高度重视战略，如果书记、校长不亲自抓，那么战略规划将达不到应有效果。再次，根据战略规划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做好战略规划的五点建议。如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学校的核心战略，将经费筹措和规划摆在战略管理的突出地位等。2013年院校研究分会在昆明举办“院校研究数据分析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学术研讨会，呼吁**在战略规划过程中，重视运用大数据解决战略“定量分析不足，实证依据缺乏”等问题，从而提升战略规划水平**。2019年，院校研究分会在武汉举办“院校发展战略规划编制”高级研修班。这次研修就新时代高校如何找准定位并制定战略目标，如何运用有效方法为规划编制提供依据，如何系统推进规划的编制、实施和评估等展开了充分研讨和交流，对“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经过20余年的努力，自觉、科学、有效制定战略规划的意识已然形成，战略规划的内涵、制定战略规划的方法和步骤已基本明确，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发挥战略规划的作用，以推进学校健康发展。但是，其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的学校书记、校长没有直接抓战略规划，学校重视战略规划的程度也不够；**战略规划与战略实施、评估的结合仍不够紧密，相互脱节的现象仍然存在**；部分高校制定的规划没有战略主题，因而难以突出战略重点，战略目标仍然停留在口号上，以战略措施代替战略行动，不重视资源配置，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解决。

2. 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审视学校发展过程

学校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的过程。在规划制定中，既要审视学校的历史发展过程，又要探讨学校发展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和位置。这样才能把握发展的目标、重点和举措。

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元素，大学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发展。学科发展是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一个学科的成长，在一个生命周期内大体要经过起步、发展、提高三个阶段。因此，在规划制定中要审视学科发展的状态和趋势，分析本学科所处的发展阶段，明确本阶段学科发展的思路、目标、行动方案和评价标准。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在理工大**

学中率先发展文科，根据学科发展规律，逐个阶段推进。在起步阶段，主要是明确创建文科的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确立“应用为主、交叉见长”的方针。在发展阶段，主要抓住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和深刻认识文科发展的意义，依托理工优势重点发展特色文科，按照学科规律统筹文科发展各要素。在提高阶段，主要抓住基础文科的发展，建设一级学科，争取国家重大项目。由于做好了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学校文科得以迅速、健康发展。

大学离不开管理，大学规划也应关注学校管理。马丁·特罗认为，“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规模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周光礼认为，如果把大学看成一个数学模型，自变量是学生的规模，学生规模变了，教师规模、教学投入和教学空间等也必然发生改变。学校的管理模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一般而言，学生规模在1万人以下，学校可以实行一级运行模式；**当学生规模超过1万人，学校则必须实行校院两级运行模式。**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教育，大学面临一场管理革命。因此，在规划制定中要分析学校发展阶段，特别是规模发展状况，从而确定管理创新的目标与模式。

学校的师资队伍、教学、科研、文化等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规划时同样要注意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

3. 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审视学校所处环境的变化

战略管理的基本宗旨是利用外部机会化解或回避威胁，它关注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大多数高校四分之三左右的变化由外界因素引发。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外向性。环境是变化的，制定战略规划一定要分析本阶段学校所处的环境。

我们现在正在制订“十四五”规划，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呢？“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转换期。刘国瑞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更复杂的因素。在这一形势下，国家面临战略目标转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治

理现代化等艰巨任务。这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一定要抓住重大战略转换机遇，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从而推进学校发展。**

二、战略重点和一般相结合

我们现在制定战略规划，一般以五年为周期。在五年时间内不可能解决太多问题，所以一定要抓住发展中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形成战略重点。同时，学校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因而也要兼顾一般，关注学校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同时只有关注一般，才能保证战略重点的实现。在各阶段战略规划之间，由于战略重点改变，学校要实行相应的战略转变。

1. 战略重点和一般相结合，准确选择战略重点

选择战略重点要建立在对学校发展过程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把握节点，形成战略重点。在战略实施过程中，要抓住战略重点，冲破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推进学校健康发展。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在制定“十三五”战略规划时，根据本校国际性不足的弱点提出了两个战略重点，即增强关键性学科实力和全力提升国际性。通过近五年的努力，学校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性大大提升。又如1956年华中工学院在制定战略规划时，根据学校当时的状况，确定战略重点为“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提高教师科学水平”。围绕这一重点，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教师投入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提升科研水平，从而奠定了学校发展的基础。

战略重点要体现在战略主题中。战略主题是战略思想的体现，是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的高度概括。要将战略重点融入战略主题之中，从而引导师生明确学校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如我国即将完成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吸取了大家的智慧，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它的战略主题是“坚持育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德国洪堡大学规划（2012.11-2017.10）的战略主题是“科学达致修养——培养探究思维”。但我国高校的战略规划大多没有**形成战略主题，在制定**

“十四五”规划时应加以关注。

2. 战略重点和一般相结合，要兼顾一般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主要职能是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管理中涉及的主要要素是理念、队伍、制度、资源、文化。在战略规划中，在抓住战略重点的同时要兼顾这些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在规划这些因素时要围绕战略重点来展开，通过兼顾一般来实现战略重点，否则战略重点就成了空中楼阁，不可能实现。

文华学院在建校时提出了三个十年目标：起步，发展，提高。2013年第一个十年结束时，学校提出了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即“优化结构、重点突破”。然后，学校将这一战略重点分解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优化学科结构，力争特色学科建设有战略性突破。学校对现有学科专业进行调整和优化，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即全校形成2-3个重点学科专业，每个学部培育1-2个重点学科专业，每个学科专业形成自己的优势学科方向。

二是优化师资结构，力争人才梯队和科研团队有标志性突破。其标志是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实现学科专业带头人主要是老教师向主要是中青年教师的转变，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的教学、科研团队能承接和完成国家、省部级重大研究项目，师资队伍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

三是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使个性化教育在实践中有创造性突破。学校要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的规模、层次和专业结构，特别要重视优化课程结构、加强课程建设，实现学校和社会的结合，教学和科研的结合，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设广阔空间。

四是优化资源结构，力争在资源转化上有发展性突破。资源匮乏是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原因。学校要努力争取资源，既向政府争取政策和资源，也要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在服务中争取资源。学校还要创造资源，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

五是优化组织结构，在发挥管理制度灵活性上有实质性突破。制度的灵活性是民办高校发展的一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制度建设上有实质性突破，从而推进学校的发展。

3. 战略重点和一般相结合，适时进行战略转变

战略重点不同，相应的战略方针、战略思想、战略行动亦不同，而且“一般”的规划也不尽相同。因此，随着战略重点发生改变，要适时进行战略转变。近40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发生改变，相应地实行了战略转变，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其突出的战略转变有三次。

第一次战略转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学校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是建成国内一流大学，为此实行了以下战略转变：由教学到教学科研相结合，由本科教育为主到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由单纯的工科到理工文管多学科共同发展。这些转变都十分重要。例如，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反映了一所大学水平的高低。在2019年，湖北大学招收研究生1000多人，本科生5000多人；华中科技大学招收本科生8000多人，研究生9000多人；清华大学招收本科生3000多人，研究生8000多人。

第二次战略转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至21世纪初，学校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是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相应的核心战略转变是**由科学教育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由教学、科研到学、研、产三足鼎立**。这两个转变由华中科技大学率先提出并持续实践，在国内高等教育发展中起到了引领作用，也有力地推进了学校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的实现。

第三次战略转变从2012年开始延续到现在，学校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教学、一流的科研、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经费和一流的管理。华中科技大学基于自身现状和存在的差距提出了三个转变：从数量发展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工医优势向综合优势转变，进行综合性大学建设；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转变。

战略转变要“适时”，学校应根据连续性发展的需要，确定是否转变、怎样转变。学校主要领导有任期，都处于学校发展的某一阶段。主要领导上任以后，要审视学校发展历史，从而确定自己任期内学校的发展目标、思路和重点，切忌为了“政绩”而不顾连续性，随意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和重点。1984年，华中工学院领导班子换届，李德焕书记、黄树槐校长沿袭了上一任领导制定的发展目标和重点，没有提出新的目标，仅在战术上提出“异军突起、出奇制胜”。李德焕书记形象地说：“前任领导挖了一个坑，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坑填满。”他们用了十来年时间填“坑”，既实现了前任提出的战略目标和重点，又为后任领导学校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每任领导都不顾发展的连续性，各人自搞一套，学校肯定难以健康发展。

三、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

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脱节是战略规划作用难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战略规划仅仅是为发展指明战略方向，确定战略目标，明确战略重点和战略行动，而要将这些转化为现实绩效，推进学校健康、持续发展，则要靠战略实施。**战略实施的难度在于，战略规划是行动前部署力量，战略实施则是在行动中管理和运用力量；战略规划是一个思维过程，而战略实施是一个行动过程；战略规划中需要协调的是少数人，战略实施则要协调全体师生的力量。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十分重要。

1. 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在规划中变战略措施为战略行动

有战略措施没有战略行动，这是战略规划制定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战略措施属于发展策略，还不是战略行动。战略行动是实现战略的具体安排，不能用战略措施来代替战略行动。战略措施可以有，但应放在战略行动中。我们的战略规划往往缺少战略行动这一部分，而多数国外知名大学的规划中都有战略行动部分。如前述洪堡大学的战略规划，它针对每个战略目标都提出了战略行动，表1显示了其针对目标3（建设“有利于学术自由”的管理）提出的具体战略行动。

表 1 洪堡大学战略规划中的战略行动（三）

长远发展：行政改革和个人促进措施		
重大行动及时间安排	行政服务网络改革计划的最终确定	2012 年 7 月 1 日截止
	研究服务中心重组	2012 年 8 月 1 日开始
	国际事务办公室的重组	2013 年 10 月 1 日开始
	人事服务中的重组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
	完成洪堡大学所有员工个人发展新计划	2012 年 5 月 1 日截止
	行政改革的评估	2014 年 11 月 1 日截止
决策机构	执行委员会,各系及部门负责人	

十四五”规划过程中，一方面要变战略措施为战略行动，而且要明确每一年的分目标和具体行动，以解决规划和年度计划脱节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把每年的行动列出来，进行任务分解。文华学院采用“清单+典型”的方式推进战略实施。“清单”指学校根据战略规划列出每年的重点工作并分解到有关领导和部门，定期检查落实，年终总结以此为依据。同时学校也注重抓典型、表彰先进，既总结好的经验，也为全校工作提供示范，从而推进战略行动有效落实。

2. 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重视资源配置**

大学是消耗稀缺资源的机构。企业与学校相比，企业水平越高，赚钱越多；大学水平越高，花钱越多。资源既是教育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大学与社会互动交换的载体。大学战略规划要十分重视资源，如果不重视资源配置，规划就难以实施。

大学三大功能的实现都要靠资源支撑。资源的多少影响大学战略选择自由，资源雄厚，战略选择就多，如果只有两三个亿，那么战略很难选择；资源结构决定校长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公办学校“跑部前进”，民办学校靠学生，那就要把教学搞好，要追求生源，两者方向不一样；资源的依赖性决定组织的管理模式；战略重点要依靠资源来保证。

资源之于大学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资源获取，即办多少事找多少钱。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给多少钱大学办多少事，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大学办多少事就要找多少钱，这就看各自的本事。第二，

资源配置，即有了钱要怎么配置，怎么保证重点。第三，资源转化，即资源成为大学与社会互动交换的载体。资源转化是资源在个体发展、组织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创造。资源转化是学校获取资源的重要方式，是在实践中解决大学办学与政府、社会之间关系的钥匙。

资源可以分为三类：基础性资源、发展性资源、衍生性资源。每一类资源又分为三种要素，基础性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性资源包括知识、政策、市场；衍生性资源包括理念、文化、制度。资源转化就是在三类九要素中相互转化。

资源转化的路径可分为三种：一是结合性转化，即资源联合嫁接路径；二是结构性转化，即资源结构优化路径；三是认知性转化，即资源内生路径。

事实上资源转化是篇大文章。前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曾多次讲到英国华威大学，该校能在较短时间内跻身世界一流，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善于资源转化。通过资源转化，获取基础性资源，实现价值优化，激活办学活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 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重视战略评估

战略评估是审视战略规划、监控战略实施并对其进行系统性评估的过程。战略评估至今仍然未被大家重视。推进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应十分重视战略评估。做好战略评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审视战略规划。战略评估首先要对战略规划进行审视和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规划是否符合高等教育规律，是否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是否符合学校发展实际，是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评估方式之一是邀请校外专家、有关领导、教师及学生代表对规划进行论证。**

其二，评估战略实施。首先，检查战略基础，了解构成现行战略的机会与威胁、优势与弱势等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何种变化，因何而发生变化。其次，衡量战略绩效，对预期目标与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在实施战略目标过程中取得的结果。最后，修正与调整战略，在检查战略与衡量绩效的基础上，作出延续战略、调整战略、重

组战略或终止战略的决定。

其三，评估资源利用效率。在战略评估中，要对全校及各单位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行评估。要考察投入与产出比，进行成本分析，通过对资源占用与消耗、工作业绩的综合分析，对学校及各单位的资源利用效率作出评估。

战略规划制定过程是一个共同创造的过程。每所大学的发展历史、学科结构、人员结构不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不同，其战略规划都需要创造。大学师生有文化、水平高、有智慧，学校规划最终要靠师生实施，需要大家认同。因此，在规划制定过程中要汲取群体智慧、凝聚共识，调动师生参与学校发展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制定好规划。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2020年7月）

“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与关键

钟秉林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面肯定了“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明确了我国“十四五”期间和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为我国制定教育领域中长期规划提供了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对“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与重点任务进行回顾与展望，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也将促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2020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收官之年，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发展目标的重要起步阶段。

“十四五”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交汇期。回顾过去，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有了良好的规模、结构、制度与环境的基础，面向未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面临着外部形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有自身的优势与困难。“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任务的关键包括：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竞争力与吸引力；适应信息化时代教育教学形态的改变，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促进高等教育集群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功能的集聚溢出，以发展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构建政府部门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以评价为导向提升教育治理能力，促进教育系统内外、教育系统各学段的发展目标与任务的协调发展，等等。

一、面临形势

现代大学深深嵌入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大学组织发生相应的改变。“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初级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将面临国内外社会形势转变、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优化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国际格局重构提出新命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近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相互交织、相互激荡，成为当前中国教育发展必须面对的国际大环境。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开始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以竞争和融合为核心的创新之战成为常态，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争夺生存权、发展权和话语权的焦点与核心。高层次创新人才成为全球科技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促进科技与教育相结合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依然面临自然科学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的现象，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等问题，尤其是

在当前国际格局重构的背景下，面临西方国家强行推进的科技“脱钩”等策略，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在这个大背景下，迫切需要我国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这对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高校科研创新、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尤其需要加强基础学科的创新应用，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为技术、组织、模式的创新提供方向指引和基础支撑。同时，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全球经济社会和自然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呼唤全球治理，我国在世界格局重构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也是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国家战略布局赋予新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放缓，国内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叠加，尤其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很多，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越来越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新技术、新产业、新职业不断涌现，社会对高层次创新型专门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迫切，圆满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需要现代化高等教育的支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发展的20年来，我国人均GDP增长率保持在6%

以上，这在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也对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面实现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区域发展战略提出新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实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战略，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战略重点。改革开放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主要是配合国家经济复苏的需要进行院校调整，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具有明显计划性的特点；改革开放后，在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思想指导下，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增强，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区域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开始关注区域公平的协调发展战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发展战略，致力于推动形成东西南北综合联动发展新格局。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充分发挥粤港澳高校联盟的作用，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态势已经初步形成，而形成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有效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耦合关系，将成为“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系统适应环境变化与需求的重要议题。

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将更加凸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和国家针对国内外局势转变做出的重要判断，也是打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这将进一步凸显高等学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区域经济协同和本地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需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

拓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局面。

（四）信息技术融合面临新挑战

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国家竞争的关键，世界各国都将人工智能技术等作为未来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以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制高点。高校是新兴信息技术运用的战场，也是新兴信息技术原始创新的主阵地，需要高校在前沿基础理论、关键共性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支持，促进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生物以及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新兴信息技术也对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以及就业市场带来明显的冲击。同时，随着信息技术产业革命的萌发，互联网教学方兴未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对高等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教育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可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实现个性化、精准化的教育支持，促进教学过程的持续改进，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在疫情防控时期，网络教学突破了个体学习与空间的限制，满足学生居家学习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并促进了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可以预期，这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将会成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契机，必将有力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但是全面实施网络教学也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一是教育技术资源配置的区域、城乡、校际差异引发的教育公平问题；二是学生自律性、家长监督有效性、教师信息素养的差异带来的教学效果问题；三是信息技术也给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组织形态、教师角色及师生关系造成了冲击，带来了教育治理的机遇与难题。“十四五”期间，随着在线教学的全面探索与实践，我国高等教育形态将发生重要改变，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也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任务。

（五）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全面深化改革依然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强调“十三五”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会议听取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部署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一些长期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破解，一大批基层改革创新的经验做法不断涌现，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十四五”时期，要继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要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聚焦人民群众所急所需所盼，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加快缩小区域、城乡差距。

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联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阶段性新特点新任务，紧扣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解决突出问题，提高教育的战略性、前瞻性和针对性，使改革更好地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诉求，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度融合、高效联动，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时代任务。

二、发展基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十三五”期间，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为教育优先发展提供了保障，教育发展成就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结构调整、制度改革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也依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成为“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与改革着力点。

（一）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05所，在学总规模11.7万人，毛入学率0.26%；2019年，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毛入学率51.6%。七十年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增长了12倍，在学总规模增长了341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了51.34个百分点；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进入快车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了41.8个百分点，经历了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大国。十九届五中全会全面肯定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目标的实现，并将其作为“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成就。

同时，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质量问题进一步凸显：首先，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招生政策、管理制度、课程内容、评价标准等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何保障不同类型高校的多样化有特色发展，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类型的高素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成为“十四五”期间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其次，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带来就业难题。“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校毕业生由765万人增至874万人，达到新增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持续在高位，就业基数庞大，形势复杂严峻。最后，新建本科院校占据我国普通本科高校的半壁江山，在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同时，新建本科院校办学历史较短、基础比较薄弱，如何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师队伍水平等，成为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任务。

总之，“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将从高速度规模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各级各类高校的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与路径选择。

（二）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分类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

提出高等学校分类管理的治理理念，《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将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术型，初步形成了国家层面的高校分类体系指导框架，并提出了国家主导、地方统筹的高校分类指导思想。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各司其职、分类发展，继而发挥组织功能的集聚溢出效应，实现教育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也能够提高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积极应变能力，使得高等教育系统本身能够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应变性。

当前，我国初步形成了分类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不同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战略格局，但是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依然有待提高。一方面，我国重点高校建设政策的实施效益有待提高。我国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实施了一系列重点建设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建设政策，改革开放后形成了多层次的重点高等学校建设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计划等。在不同历史时期，重点高校建设政策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缩小了我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差距。目前，“双一流”建设高校陆续完成首轮建设成效的总结评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一流人才培养的质量与原创性成果的匮乏。另一方面，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尚有待时日。2015年，教育部、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推进地方普通高校转型发展，从供给侧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推动地方支持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高校发展，推动应用型高校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课程结构，聚焦社会需求和岗位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但是应用型高校与职业技能型高校如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结合，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还需要进行艰辛的探索。

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切实提高不同类型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以及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发挥的效益。

（三）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包括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四级层次结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逐步完善。截至201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3317.90万人，其中专科生1280.71万人，本科生1750.82万人，硕士生243.95万人，博士生42.42万人，分别占在校生总规模的38.60%、52.77%、7.35%、1.28%。进入新时代，我国学位体系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必须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这对学位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学位诉求。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加快调整学位类型结构，从1990年开始设置专业学位，2000年专业学位种类11个，2011年增长为39种，到2019年增加到47种，专业学位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提出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另一方面，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并且表现出了愈来愈强烈的学位设置诉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等政策文件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不少高职院校提出了学位设置诉求，在地方层面出现了“工士”“匠士”“专业副学士”等学位或者荣誉学位证书的探索，也有政协委员建议设置副学士学位，打通高职与本科教育的培养通道。

总之，如何提升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以及满足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学位设置诉求等，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高等教育的治理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持续深入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逐步建立起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形成了公办和民办并存的办学体制，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建设与重构一直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尤其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高等教育治理与决策越来越受到不同利益群体多元化诉求的影响，不同领域的教育改革可能也会存在制度重构的冲突与矛盾，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

“十三五”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多项改革方案，如《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等，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这为新时代我国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这是落实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纲领性文件。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在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法等方面体现出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特征，为新时代优化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发展重点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要以转变教育思想观念为先导，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动力，以破解重点难点问题为抓手，集中精力抓好内涵建设，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社会公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选择性需求，为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一）构建分类发展的质量保障体系

迈入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面临教育系统内外部的难得机遇与严峻挑战,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呈现出某些共性发展趋势,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要基于中国实践探索,更新教育发展理念,树立多元化的质量观,推进高校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实现不同类型高校的分类发展,满足普及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多样化、个性化教育需求。

第一,构建多样化的高等质量保障体系,在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业认证、状态数据常态监测、国际评估的“五位一体”质量评估活动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第二,确立高校质量保障的主体地位,构建多样化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高等学校应以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专业认证、教学评估等重要任务为抓手,建立起以专业教学为基础、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持续提高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性。要践行学生中心、结果导向、持续将学生学习效果的跟踪评价作为质量评价的重点,开发和完善基于中国学生体验的评价指标和评价量表,全面客观地呈现高校人才培养的效果。第三,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质量文化。以“十四五”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为契机,推进高等学校干部和师生员工凝聚发展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在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基本功能的过程中,注重反思和升华,形成具有高校特色的质量文化内涵。

（二）推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变革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是新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制定和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战略任务之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技术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改变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方式,导致了高校教师角色的转型和师生关系的变化,冲击着高校的教育教学观念和办学理念、教学组织形态和教室布局、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以及教学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高等学校要保持敏锐的目光,密切跟踪发

展趋势，积极开展多样化探索。

第一，发展在线教学，扩大优质高等教育教学资源覆盖面。要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发挥在线教学优势，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尤其是助力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第二，提高在线教学质量，探索线上线下教学融合。在线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在线教学如何实现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探索“网真”课堂；线上线下教学如何实现深度融合，构建后疫情时代混合式教学的新常态；如何加强线上教学质量监控，探索新教学方式的质量评价等，都需要加强政策导向，引导和鼓励教师进行实践探索。第三，提高师生信息素养，加强信息化教学能力建设。要顺应科学技术和教学改革发展趋势，通过校本培训等手段，切实提高高校师生的信息素养；同时要重视提高教师的学科交叉和课程整合能力，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跨学科综合性教学，探索跨专业（类）人才培养。第四，发挥信息数据优势，加强对师生发展和学校发展的跟踪与评价。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实现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监测和预测，促进教学决策科学化、教学管理精细化和学生学习个性化。第五，重视在线高等教育治理。信息技术的普及将影响教育决策与治理，网络舆情也将影响政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以及高校的社会声誉，对高等学校治理带来极大的外部挑战。要重视舆论引导作用，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建立教育领域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提高应对社会风险与舆情问题的能力。

（三）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发展

从层次结构来看，“十四五”期间，一方面要重视本科教育，深入实施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行动，全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另一方面，要重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探索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发展，既要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又要面向社会需求培养本专科层次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要妥善解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学位诉求问题。笔者调研发现，目前存在三种观点：增设独立的职业教育学位体系、依托现有学位体系满足职业

教育学位诉求、在专科教育阶段增设副学士学位。无论哪种构想都存在现实基础与实践困境，应进行科学论证与利弊分析，理性回应社会诉求。

第一，在部分省份实践探索基础上，增加专科学位改革试点，为修订《学位条例》提供中国经验，适时建立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第二，完善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培养，积极探索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科教融合、本硕博贯通培养；大力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培养。可以将职业教育学位诉求纳入现有的专业学位体系中统筹考虑，完善职业教育从专科教育到博士教育完整的教育体系，促进专科教育向“上”发展道路畅通、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协调融通发展。第三，完善新的学位质量评估平台，将评估专家进行“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分类登录与管理，吸收行业、企业等符合评审条件的专家进入到专业学位评审专家库，进一步完善区别于学术学位的专业学位评审指标体系。

（四）推进高等教育集群发展

“一带一路”、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构成了我国未来区域发展战略总体布局，“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领域的战略重点之一是以发展为导向，实施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战略，发挥高等教育功能的集聚-溢出效应，服务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从国际经验来看，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关键是形成区域高等教育协作发展机制。

第一，发挥政府主导、市场推动、高校主体作用，促进高等教育的区域协同发展。依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环境差异，发挥政府统筹和市场拉动作用，强化高校的主体作用，主动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区域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良性互动。第二，完善区域高等教育协作机制。与欧洲区域范围高等教育的区域合作不同，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协作发展是在同一教育体制之下的协同合作、发展共赢，有力支撑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要在省级政府战略合作框架之下，探索高校之间战略联盟的深度发展，尤其

是学科专业的协同发展；构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促进师生深度交流，协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科建设水平。第三，完善教育对口支援机制。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东部地区高校对中西部地区高校开展的对口支援，应该更加强调提升中西部高校的自主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受援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功能溢出效应，切实提高中西部高等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

（五）优化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方案，引导大学协调好大学与社会、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进而解决学校与政府关系不顺畅、学校与社会关系不协调、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推进学校内涵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重要任务。

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要发挥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落实学校的主体责任，鼓励多元参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体现在：第一，充分发挥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的教育督导部门在新时代教育评价中的主导作用，保证教育改革发展与学校办学方向。第二，进一步强化学校的办学主体地位，将资源配置、经费使用、考评管理的权利下放给学校，切实落实和逐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推进学校内部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依法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学校制度。第三，鼓励和引导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的参与，提高教育评价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完善政务公开、民主管理和问责制度，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总之，“十四五”时期构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重点依然是改善政府宏观管理、完善大学领导体制、优化大学组织机构、保障大学民主管理、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深化管理运行机制和运行机制改革，营造优良校园文化和育人氛围等。

（六）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

面，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这要求“十四五”期间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继续扎实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一是探索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式，拓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领域。积极拓展新兴国际教育合作项目，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加强政策导向，与国外合作高校共同开发合作项目，评价实施成效，总结相关经验。二是发挥信息技术优势，主动探索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关注新冠病毒疫情对师生国际流动造成的物理阻断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立足本土本校，提升全体学生的国际化和跨文化素养，探索形成教育国际化新格局。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促进学术讲座、短期课程、国际论坛等在无人员跨国流动的情况下有效实现。组织引进优质的国外课程资源，就地服务于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国际化战略。三是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完善来华留学生招生标准，优化来华留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和管理体系，发挥我国疫情防控成效的制度优势，提高来华留学教育的吸引力，不断提高教育国际化的水平与效益。

（来源：中国知网 2020年11月13日）

【省内速递】

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2020年会暨陕西高等教育论坛成功举办

11月28日上午，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2020年会暨陕西高等教育论坛在宝鸡文理学院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建林，省高教学会会长、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高教学会副会长、西安理工大学校长李孝廉，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杨鹏等出席会议。

刘建林指出，“十三五”期间，我省将“办学有特色、发展有优势、工作有亮点”作为高校发展的总要求，系统推进一流本科、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环节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面临全国高等教育“前甩后追”的发展压力，全省高校要由紧盯自身发展小逻辑转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逻辑，谋深谋实“十四五”规划，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断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深化区域间高校集群协作发展，为新时代陕西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贡献人才力量。

刘建林强调，陕西省高教学会作为陕西省高等教育重大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智库”和联系广大高教工作者的重要“纽带”，要继续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力求解决“真问题”，保证“真管用”；进一步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为全省高校综合改革提供专业性、综合性咨询服务；持续完善学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学会规范化水平。

郭立宏代表省高教学会致辞，并宣读了《关于表彰“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的决定》。

李孝廉主持了校长论坛，并参加了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对学会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学会有关人事变更情况进行了审议。

我校校长办公室、高等教育研究所相关人员，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有关师生代表参加会议。

（主要来源：西安理工大学官网 2020年11月30日）

陕西省召开学科建设工作座谈会

近日，陕西省学科建设工作座谈会在西安召开。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刘建林出席并讲话，省政府学位委员会秘书长袁宁通报全省学科建设有关情况。

座谈会上，各参会高校围绕“双一流”建设、学科内涵发展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存在问题、对策和措施作了交流，肯定了陕西省推进学科建设的有关做法，并就交叉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平台建设、经费投入、政策倾斜和资源整合等方面建言献策。

刘建林指出，学科基于知识分类，蕴含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专业建设、服务社会、合作交流等方方面面的集合。学科建设是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是学校上层次、上水平的关键。他强调，各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批示以及全国、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加快学科优化调整，加强基础学科深化建设，推动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持续打造陕西学科体系“升级版”。他要求，各高校要把优势、特色学科建设作为内涵建设的核心工作，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下大气力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袁宁通报了近年来陕西省学科建设有关情况，分析了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就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明确了下一步工作思路。

按照陕西省“双一流”建设层次，座谈会分两批举行，“双一流”建设高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省教育厅有关处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来源：陕西省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 2020年11月18日）

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

11月24日至25日，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陕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秘书长袁宁出席会议并致辞。全体校领导出席会议，校党委副书记李建竹主持会议。

袁宁在致辞中代表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为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道路指引和根本遵循，陕西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确定了未来一段时间我省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施工图”和“路线图”。他肯定了我校近年来研究生教育取得的成效，并对学校加快推进研究生改革发展提出了建议。他希望学校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不断推进学科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推动学校“双一流”建设和整体办学水平再上新台阶。

校党委书记刘德安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并就做好学校研究生教育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要认真学习、精准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强化改革意识，突出质量提升、内涵发展、严格管理；要切实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的“四有”导师队伍；要努力打造具有西理工特色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推进我校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校长李孝廉在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做好我校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改革工作，一是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勇担立德树人使命；二是要坚持聚焦重点，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三是要坚持质量优先，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四是要坚持统筹全局，强化研究生教育保障。他强调，要以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为中心，创新工作思路，凝聚工作合力，抓好工作落实，以更高远的时代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坚定的使命担当，推动我校研究生教育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奋力谱写西理工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副校长刘军宣读了《西安理工大学关于表彰特殊贡献奖导师和优

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决定》。谢定义、魏兵两名教授获研究生教育特殊贡献奖，华灯鑫、解建仓、白丹、高峰、黄强、李守义、刘宏昭、师俊平、王全九9名教授获优秀导师奖。校党委书记刘德安、校长李孝廉先后为受表彰人员颁奖。

副校长梁淑华作了题为《以提高质量为目标，以发展改革为动力，奋力开创西理工研究生教育新局面》的专题报告。她结合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总结回顾了“十三五”以来我校研究生教育取得的显著成效，深刻剖析了当前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并围绕思政育人质量、导师指导能力、学生科研能力、质量保障体系、学科特色育人、组织管理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学校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六大改革举措，进一步聚焦改革关键环节，不断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

会上，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张晓晖、水利水电学院院长郭鹏程、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院长朱记伟分别作了有关研究生教育的经验交流。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院分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各学院负责人及研究生管理工作人员，导师代表、学生代表共计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共分为四个单元，会议历时两天，包括专题会议、分组讨论、专题研讨和总结汇报。期间，与会人员结合会议主题和学习资料，围绕学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开展研讨交流。

学校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厘清改革思路、明确改革目标，凝聚改革共识、促进改革创新，不忘初心再出发，肩负使命铸辉煌，持续开创西理工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新局面。

（来源：西安理工大学官网 2020年11月25日）

报送范围：校领导、学校中层领导干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学科建设委员会
委员会委员、教学委员会委员（电子版）

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5#

网 址：<http://fzxx.xaut.edu.cn/gjj.htm>

邮政编码：710048

电子邮箱：gjs@mail.xaut.edu.cn

办公地点：综合楼1号楼210室

联系电话：曹从军(029)82312821 周力人(029)82342543

周 融(029)82312543 陈禹均(029)82312543
